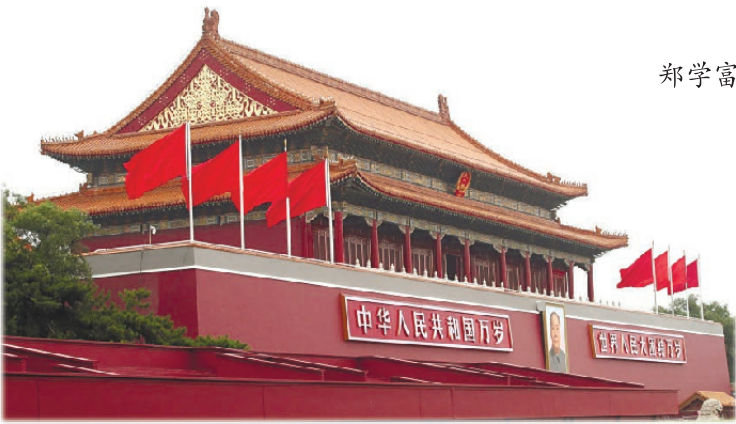


# 电影《开国大典》拍摄记

郑学富



1989年9月,在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之际,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献礼片《开国大典》在全国上映。该片用纪实的手法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开始,直至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的历史过程。制作者以宏大的视野,将纷繁复杂的历史提炼和概括为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影片思想内容深刻、规模宏大、历史人物众多、历史事件交替发生,是在当时条件下难得一见的好作品。多年以来,这部电影在荧屏上多次播出,很多场面已成为几代人的记忆。

## 四位编剧强强联手

1988年春,在一次聚会上,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滕文骥提出想拍摄一部电影《开国大典》,向新中国成立40周年献礼,在场的长春电影制片厂主管剧本创作的副厂长张笑天表示愿意合作。于是,一个由张笑天、张天民、刘星、郭晨展创作的创作班子就此成立,这四位编剧各有擅长,可谓珠联璧合。

四人在长春的清华宾馆商量剧本思路,在交谈中碰撞出火花,他们一致认为剧本要有突破,人物要有血有肉、有正常人的感情,而不是神化或漫画了的人。这些看似很普通的想法,在当时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另外,他们决定尽量不把剧本写成“编年史”,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基本都被推至背景,作为影片中人物活动的舞台,宏观上采用写意的手法,而在刻画人物和表现细节时,则采用工笔细描的手法。

思路出来后,由刘星执笔,写出了第一篇。之后,张天民改出第二稿,张笑天定终稿。1988年7月22日,《开国大典》电影剧本获得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的认可。

剧本写好后,刘星给西影厂送了过去,但出于某种考虑,西影厂放弃了拍摄计划,于是长影厂决定接手,单独投资该片,投资总额为500万元。长影厂的领导想让以拍摄重大历史题材著称的李前宽、肖桂云夫妇担任导演。

## 名导夫妻迎难而上

1988年8月的一天,李前宽和肖桂云正在长影厂的摄影棚里拍摄反映李大钊光辉生涯的12集电视剧《血洒故都》,张笑天送来了剧本《开国大典》。李前宽拿到剧本后,非常激动,几乎是一口气看完了7万多字,他看得十分专心,还不时在小本子上写点什么。看过后,他一句话没说,又交给肖桂云。待肖桂云看过,李前宽问她印象如何,肖桂云说:“大手笔!正是我们期待的。”两人从拍摄完成《佩剑将军》起,等了8年,等的就是这样的剧本,他们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种创作冲动。

1959年,李前宽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电影美术系。1960年,肖桂云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二人是上下级同学,从那时开始便相识相知。毕业后,二人先后分配到“新中国的电影摇篮”之称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李前宽从美术助理、场记做起,后来当副导演、导演。而肖桂云在1977年就执导了个人首部电影《希望》,从而开启了她的导演生涯。1981年,夫妻二人首次合作,联合执导了剧情

那一天,我凝视着那幅悬挂在墙上的彩色平面地图,忽然间它好像不再是纸与墨的堆叠了。它在我眼前渐渐变成一幅立体的画面,凸出山峦的脊背,淌出江河的血脉,显出平原的起伏。

那自西向东的一片苍黄,无疑是西北高原了。我虽未曾亲至,却仿佛看见沟壑纵横的黄土地,如同老人额上深刻的皱纹,每一道都镌刻着千年的风霜。那里的人们,想必是有着黄土般的质朴与坚韧,在干旱少雨的土地上,种出金黄的粟米和火红的高粱。风沙起来的时候,天地浑黄一体,人行走其间,渺小如沙,却又顽强如沙棘,扎根在贫瘠之中,生生不息。

目光稍移,看见了青藏高原的巍峨。那片世界上最高的山脊,白得耀眼的雪顶是它的冠冕,蓝得深邃的湖泊是它的眼睛。藏民们的诵经声随风传遍山谷,经幡猎猎作响,仿佛天神与凡人之间的低语。那里离天太近,以至于人们走路都要慢些,说话都要轻些,生怕惊扰了天神。我在这地图之外,似乎也能感受到那份肃穆与崇高,灵魂似被雪水洗涤过一般。

江南水乡却是另一番模样了。长江三角洲的绿色平原上,河网如织,舟楫往来。春来油菜花开成金色的海洋,秋至稻浪翻滚出丰收的欢欣。那里的人说话软糯,如糯米团子,但骨子里却有着水般的韧性——既能绕指柔,亦可穿石过。乌篷船摇过千年古桥,桥上的青石板被岁月磨得光滑如镜,照见过多少代人的悲欢离合。

岭南以南,热带的风物便迥异于中原地区了。榕树垂须如老者长髯,荔枝、龙眼挂果时枝头沉甸甸地弯下腰来。这里的人敢为天下先,既守得住古老的宗祠文化,又闯得出开阔的海洋文明。口音铿锵如碎玉,饮食清淡中见真味,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总比别人多几分豁达与通透。

我的目光又停在那条绵长曲折的海岸线上。

电影《佩剑将军》,并一炮打响。从此,夫妻二人跻身著名导演之列,张笑天曾戏称二人是“电影夫妻店”。

二人接到剧本时距离新中国成立40周年还有一年多的时间,要在短时间里完成一部上下两集鸿篇巨制的摄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通常来说,这样一部电影需要筹备一年,拍摄一年,然后花半年时间做后期。光是“开国大典”这场戏的拍摄,就是个难题。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和1949年时完全不同,几十万人的群众场面怎么组织?剧本里有名有姓的人物达138个,怎么让众多人物鲜活地呈现在银幕上?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三大战役、北平和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北平入城式、百万雄师渡长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这些事件哪一个都可以单独成篇拍摄一部影片,可要把这么多事件集中在一部影片里,故事应该怎么讲?周围的人都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李前宽夫妇与国庆太有缘了——国庆10周年,刚踏入大学校门的李前宽是文艺大军的排头兵,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检阅;国庆20周年,李前宽和肖桂云结为夫妻;国庆30周年,肖桂云拍了《包公赔情》《桃李梅》两部献礼片;国庆40周年,他们又迎来了拍摄《开国大典》的机会……有深厚国庆情结的他们欲罢不能,夫妻俩认为,影片越是难拍,才越应该拍,拍出来才越有影响。

李前宽夫妇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拍摄筹备工作,用“立体战争”的打法全面推进。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就完成了电影《开国大典》的几乎全部筹备工作,包括选外景、加工设计、选演员、造型与服装设计、制作道具、准备试片、分镜头、选看资料片,等等。

## 巧用历史资料片

1988年11月11日,《开国大典》剧组在中南海开机。第一场戏,是实景拍摄开国大典前夜,毛泽东与儿子毛岸英谈话的重头戏。毛泽东对儿子回忆,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时曾跟他谈过,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似乎都难逃“其亡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毛泽东向儿子解释这句话的含义。

在拍摄开国大典这场影片中的高潮戏时,剧组直接登上天安门城楼,几百名离退休老干部、老战士参与了拍摄。如何才能在天安门广场重现1949年的盛况,当时有人提议在长春地质宫广场搭建一个天安门外景,施工方要价500万元,且工程完成需要一年的时间。李前宽直接拒绝了,因为影片的全部投资才500万元,而且时间上也不允许。

此外,广场上欢呼雀跃的数百万群众和威武雄壮接受检阅的三军将士又该如何表现?李前宽不愧是美术设计出身,他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让历史资料片也参与到创作中来,将珍贵的开国大典历史纪录片资料与新拍摄的镜头剪接在一起,纪实性与表现性相结合,使之形成新的电影语言。

但如何将历史资料片与新拍摄的画面严丝合缝地融合在一起,这又是一个难题。制作人员从整体结构和节奏上有章法地进行布局和衔接,通盘考虑镜头的景别、机位和长度,通过影片色彩的渐变,把资料片加工成茶色影片,

从北到南,明珠般的城市串成项链,佩戴在祖国的胸前。海浪日夜不停地拍打着这片古老的土地,带来远方的消息,也送出自家的儿女。而更远处,那些散落的岛屿,如珍珠般撒在蓝缎子上,每一粒都值得用心守护。

这地图上的每一寸土地,都不只是地理层面的存在。陕北的信天游还在山沟沟里回荡,东北的二人转依然热闹红火,西南的山歌穿过云雾,江南的吴音如水般流淌。五千年的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出的花各不相同,结出的果各具滋味,却又同根同源,血脉相连。

我忽然明白,我凝视的不仅是一张地图。那上面有秦始皇统一天下的雄心,有汉唐盛世的开放气象,有宋明文人的风骨气节,更有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热血。这片土地见过辉煌,也经历过苦难,但始终生生不息。当我最终从凝视中抬起头来,墙上的地图似乎在微微颤动,如同一个正在呼吸的巨人的身躯。我知道,我只是这片土地上十四亿分之一的存在,渺小如尘。但我也知道,正是无数个如我这般渺小

的存在,共同构成了这个伟大的国家。这地图不是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那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是我们来处的根,也是我们去向的路。每一次凝视,都是对这片土地的一次无声誓言;每一次离开,都是为了更好地归来。

山河万古永在,祖国常系心中。

# 满庭芳

第五三九一期

又恰到好处地从茶色变成彩色。这样,就使今昔两个时期的历史画面自然衔接起来,浑然一体,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凸显出情节的震撼性、真实性和文献性。很多看过电影的人都迷惑:电影最后那十几分钟,到底是演员演的还是真实的纪录片?

李前宽、肖桂云夫妇在资料库中,从几千份资料胶片中一一筛选。据统计,电影《开国大典》从开篇到结尾,共有40多处资料片镜头与拍摄的新镜头融为一体,这种“真”与“假”相互碰撞后的“化学反应”,生成一种真实性与假定性、纪实性与表现性相结合的美学风格,赋予了影片一种历史厚重感和真实质感。正如他们所说:“我们试图让纪录片的真实性镜头和自己拍摄的表现性镜头碰撞出‘火花’,帮助观众在真实性的画面中重温历史,在表现性的画面里感受信仰的力量。”

《开国大典》剧组辗转全国12个省市,动用了群众演员约15万人次,历时7个月,最终完成了拍摄。

## “双片”合璧大气磅礴

1989年6月11日,电影《开国大典》拍摄完成。7月份,“双片”制作完成。所谓双片,是由两条胶片组成的工作片,一条为电影镜头,一条为台词、音乐、音响混录而成,通过声画双机同步放映。7月底,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混录室,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审查了《开国大典》双片。大家普遍认为,片子拍得很好,大气磅礴,史诗般地艺术再现了新中国诞生的历史画卷。

电影以全景画卷式的视角再现了开国大典前后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表现辽沈战役时,用一个固定画面营造出战斗结束时的场景——硝烟弥漫、战马哀鸣,国民党军旗被火焚烧,同时穿插资料片加旁白;表现平津战役时,将资料片与新拍摄的镜头相结合,展示了北平城门前,解放军与傅作义的起义部队换防的情景;表现淮海战役时,则选择战役结束时的场面,重点展现了华野司令员陈毅与独腿小战士和自杀未遂的杜聿明之间的两场对手戏;表现渡江战役时,则有意识地把“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历史画卷展现出来,通过几十个镜头的蒙太奇组接,体现出革命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抢渡长江天堑的英勇气势。

剧本中有一场戏,是描写毛泽东接到前方战报,得知解放军已攻过长江、打到总统府时,豪情满怀地写下了“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诗句。在拍摄现场,李前宽和肖桂云改变了这场戏的表现方式——由古月饰演的毛泽东深知已经胜券在握,十分疲惫的他在作战地图前的椅子上打起盹来。这时,手里拿着战报的叶子龙兴奋地冲进来,发现毛主席睡得正香,不忍心打扰他,就轻轻地把战报放下。这样的对比,产生了一种“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在表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时,电影选用历史影像资料加画外音的手法,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一分钟内得到了近乎全方位的展示。

1949年9月30日下午6时,当夜幕将要降临时,参加政协会议的全体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这场戏采用的是象征性的处理手段,画面呈现出一种带有历史感的色彩,黄昏中的松柏、基石和庄严肃立的领袖们,伴随毛泽东宣读碑文的画外音和深沉的主题音乐,一锹锹沙土从不同角度缓缓洒落而下,把对革命先烈的悼念之情,融合在富于造型表现力的画面中。当镜头仰拍基石和太阳的画面出现时,叠化山冈上无数牺牲的先烈,再叠化飞翔的和平鸽,运用这种动静交织、情景交融的浪漫主义的方法,显示了独特的神韵,达到了鼓舞观众的艺术效果。



繁花似锦(中国画) 陈香含

在古都洛阳的洛河岸边矗立着一座天下闻名的佛教古寺——白马寺。在天津北运河畔有一座与洛阳白马寺素有渊源并受过皇封的明代古刹,它的名字也叫白马寺。

天津的白马寺之所以与洛阳白马寺结缘,在于该寺开山祖师的来历及寺院的建筑布局。洛阳白马寺是佛教传入我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相传东汉明帝时,秦景等人去西域求取佛经,在月氏国巧遇来自天竺国的摄摩腾和竺法兰二僧,几人同行,用白马驮经迎回洛

## 文物古迹里的天津故事(十一)

# 天津也有白马寺

章用秀

阳。次年建寺,以白马命名,被称为“中国佛教之源”。到了一千多年后的明万历年间,恰有一位从洛阳远道而来的游方和尚来到天津靠近北运河的一块高地,要在这里兴修庙宇,一时十里八乡纷纷“奉献”。至万历20多年(1592)盖起一座有三重大殿、占地20多亩的大庙。这位云游和尚便成了该庙的住持,为了寄托对故乡及洛阳白马寺的思念,他请人按照洛阳白马寺前白马石雕的样子,也雕了一座背驮驮经卷的石马,置于大雄宝殿前,且取庙名为白马寺(也称白马庙),其所在村起名白庙村。明朝末年,战乱频仍,先是闯王的大军

眼明朝的官兵在这里打了一仗,紧接着清军入关,白马庙被烧了一把大火,偌大一片庙产被烧成残垣断壁。到清代,庙里的和尚各奔东西,只剩下几间破房,成了村里人织席晾网的地方。清初海宁籍学者、武夷殿大学士查慎行沿运河乘舟而行,驻足于此,赋《白庙》诗一首,勾画出白马庙当时的衰败景象。

康熙四十年(1701),宣兴埠有位叫吴琪仁的老秀才,屡试不第,那年又进京赶考,还是名落孙山,归途又遭路劫,行至白庙村自寻短见,

不想被村民救下,于是便在白马庙削发为僧,法号文渊。康熙四十六年(1707)春春节期间,康熙帝“南巡”,回京时在丁字沽一处行宫小住,适逢白马庙新塑的一座观音像落成。文渊换上崭新的袈裟,壮着胆子赶奔行宫,恭请康熙帝为观音像开光。农历五月十九,康熙帝真的来到白庙,但见殿前白马虽经劫难,却安然无恙,不觉心花怒放。那天,春风和煦,碧空如洗,西南方一缕白云冉冉飘来,恰又有玄鸟啼鸣,掠空而过,康熙帝记起李白《独坐敬亭山》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之句,当场挥毫,写下“孤云寺”三个大字,还破例钤盖了双龙御印。

国庆节,是个欢乐的日子,也是个甜蜜的日子。国庆假期,亲友聚会,离不开鲜果佳肴,也离不开甜蜜的糖果。国庆中秋两节相连,假期充裕,天气适宜,良辰美景,寓意圆满,也是举办婚礼较为集中的日子,更离不开表达幸福的甜蜜的糖果。在我收藏的数千枚糖纸中,国庆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些洋溢着喜庆色彩的糖纸,通过独特的艺术语言,集中体现了国家大事、民族情感和历史底蕴。每一枚国庆题材的糖纸,都镌刻着时代的印记,叙述着新中国发展进步的光辉历程。

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全国各行各业纷纷拿出“拳头”产品。上海“大白兔”奶糖凭借优良的品质和口碑,成为国庆献礼产品,开始闻名全国。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流传着一句广告语“七粒‘大白兔’奶糖等于一杯牛奶”,这是对“大白兔”奶糖的赞誉,它也成为人们渴望得到的营养品。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其先遣团成员喜欢上了中国的“大白兔”奶糖,于是中方赠送给美国代表团的礼品中就有了“大白兔”奶糖。在我们成长的年代,即使是在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大白兔”奶糖也不是轻易能够买到的,“大白兔”奶糖至今仍能市场上见到,可谓中国销售时间最长的知名糖果品牌。如今,“大白兔”的味道丰富多样,有芥末味、红豆味、椰奶味、酸奶味、芒果味、榴莲味等十余种。为了搜集糖纸,天津我曾买过不同口味的“大白兔”品尝,但最钟爱的还是那种原汁原味的“大白兔”。

196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天津倾力推出“大庆”牌奶糖,在全国迅速叫响。“大庆”牌奶糖的糖纸有多种版式、不同颜色,主要图案为宫灯,灯上印着“大庆”二字(题图)。收藏爱好者普遍喜欢的一种“大庆”糖纸,以红色为主色,主图为三面鲜艳的红旗,上面悬挂着一只大红灯笼,灯笼上的数字“20”字样清晰醒目;两侧副图为排列整齐的红旗随风飘扬,加上腾空而起的气球,烘托出一种节日气氛,充满了喜庆感;黄色的辅助底纹,将汉语拼音“DAQING”“NAITANG”及相关汉字衬托得很明显。糖纸边上印有“69”编号,代表生产年份。这种“大庆”糖纸设计精巧,匠心独运,既突出了商标品牌,又彰显了节日盛况。天津“大庆”糖纸是中国糖纸史上主题最鲜明的国庆糖纸,我藏有十余种。

从我收藏的糖纸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天津不仅继续发挥糖果业的优势,着力开发糖果新品种,还积极引进外地特色风味产品,国庆市场上的糖果更加丰富多彩,为广大大市民所喜爱。1984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天津市糖业糕点公司所属各批发部于国庆节前夕在天津投放各类糖果,达340多个品种。包括起士林食品厂的“可可”奶糖、“乳白”奶糖、“罗赛尔”糖、香酥巧克力豆、友谊食品厂的“红梅”奶糖、“嘉宾”奶糖、“巧思”奶糖、“哈密瓜”奶糖等,都是当年生产的新品种。其中白兰地“巧思”糖是用青岛产的特种金奖白兰地配制,吃在嘴里有一股酒香味儿。以橘子、可可为原料配制的双色双味“福寿”糖,甜度较低。此外,从全国各地组织调进的30多种、100余吨糖果,皆具有地方风味特点,如广州的“凤凰四彩”硬糖、上海的“大白兔”奶糖、青岛的“高粱饴”、乳山的“花生牛轧”、哈尔滨的酒心巧克力等,都是市场上的紧俏品种。市糖业糕点公司所属的各区零售单位都特设糖果专柜出售,增添了国庆佳节的喜庆气氛。“高粱饴”“花生牛轧”及酒心巧克力等糖纸由此也逐渐进入收藏爱好者的视野,成为糖纸收藏新品种。这几类糖纸,我集存有几十种。

1989年,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为契机,糖果市场出现了新的繁荣景象。当时龙门大厦天津站食品商场举办了一场京、津、沪等地糖果联合展销,从中可以发现,糖果销售出现了包装新、果味浓、名牌俏等新变化。这次展出的天津、北京、上海、江苏、辽宁、海南等地的五十多种糖果,均以其独特的包装吸引了消费者。传统的蜡纸包装,已逐渐被图案精美的玻璃纸“枕”式包装所取代。广东生产的七色果冰系列“枕”式硬糖更是别具一格,透过白色玻璃纸,呈现出形状各异的红、黄、绿等七种不同颜色,有的糖果当中还夹有果脯,给人一种清新、透亮之感。此外,各生产厂家还推出多种新型果味硬糖,如水蜜桃、杨梅、哈密瓜、荔枝、椰子、橙汁等高档水果风味糖果,十分走俏。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更注重糖果产地和名牌产品,如上海的“白脱司考奇”“咖啡司考奇”、扬州的“酸三色”、北京的“花生枣泥”、天津的起士林巧克力等,价格虽高,但销势很好。国产及进口的各种形状、香型的口香糖、泡泡糖,市场销量激增。糖果品种增多,糖纸作为包装的花样也不断创新。当年在国庆市场畅销的这些新品种糖果的糖纸,我亦多有集存。

至20世纪末,随着人们不断追求更为科学、健康的饮食方式,糖果的市场需求量明显减少了。但是作为节日和婚庆的食品或礼品,糖果仍然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这些被珍藏着的老糖纸,以其生动的图案、鲜艳的颜色,印证着那些沸腾的生活、甜蜜的日子。

自康熙帝赐“孤云寺”御匾后,白马庙“身价”倍增。不过数年,寺院大兴土木,再塑金身,不仅恢复了先前的气势,还在前庭的大槐树下建了一座八角重檐的御匾亭,来庙进香及瞻仰御匾者络绎不绝。至此,白马庙又见孤云寺之名。有关该庙的历史及其在天津的地位,天津方志和风物书中多有记载。《天津县志》里说:“孤云寺原名白庙,在城北潞河口岸……有圣祖御书赐额。”

白马庙自清末以来日渐颓圯。尤其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白庙村在劫难逃,白马庙亦伤元气。后来有白庙村富商乔桂林出资修复过一次。1934年,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亲至白庙村视察防务,认为该地应设立学校,遂选中白马庙为校址。不久,于学忠离津南震来津,旧事重提,于是决定在该庙设立第四十一小学,也称白庙小学。抗战胜利后,改为第三区第三十保国民学校。

白马庙历尽沧桑,早已一改旧观。侥幸的是,当年康熙皇帝御赐的“孤云寺”匾和寺内的一口古钟却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孤云寺匾为汉白玉所制,被宽1.46米,宽0.70米,厚0.15米,上镌“孤云寺”三个阳文大字,在上角镌有“赐”字,落款为“康熙四十六年五月十九日御书”,书法遒劲,雕工精细,四周云纹雕饰,端面有榫槽。关于那口古钟的来历,据说是清道光年间发大水,有几根木棍架筏驮着一口大钟,从北运河上漂浮而下,漂至白庙湾兜处,村民们将其打捞上来,挂在白马庙大槐树的树上,成了该庙一景。如今,为保护文物古迹、弘扬历史文化,白庙村特建御匾亭和古钟亭,将御匾和古钟置于亭内,并立白马寺庙碑,建殿宇及文物展示厅,供游人参观游览。



沽上丛话